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刘沂伦
【乱世人生】	死去的父亲也难逃厄运	王佩民
【亡灵祭坛】	白桦：还卜琴父以美丽	林 渊
【劫后反思】	校友热议樊思清忏悔（下）	孙怒涛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 刘沂伦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师大女附中高31班的学生。我曾经写过一个关于文革初期两年的回忆，其中包括“校长之死”，是2000年我退休后开始写的，后来又不断回忆修改，纠正记忆上的误差。现在我把当年的亲眼所见重新整理写下这篇证言，个别细节可能还是会有误差，但是我所说的主要内容都是真实的。我不是基督徒，否则可以在上帝面前发誓，现在我只能以我的人格保证我说的是真话。

（一）关于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下旬我和大多数同学被安排到邢台某部队参加军训，7月31日部队开了一个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大会，大会最后宣布接上级指示军训提前结束。本来是8月1日开庆祝会，因为接到北京方面的指示，就提前一天召开了。部队首长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我记得其中提到：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这句话和之前我在学校里听到的工作组领导在各种场合说的话精神一致，按说不应该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但是，第二天我们就回北京了，从永定门车站走向学校，进了校门就发现学校里的气氛大不一样。听说工作组撤走了，也没有人向我们宣布休息几天然后如何如何，或者某天到校开个什么会之类的话，大家就地解散就没人管了，总之是既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所以，关于“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这话让我记住了。

学校宿舍楼前墙壁上挂着很大的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旁边还有一张大字报，题目用红墨水写着：“自来红们站起来！”文章好像是从别的学校抄过来的，大意是，我们是革命后代，从一出生就是红色的，是天然的革命者，云云。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不过反工作组的同学并不等于就是“主义兵”，我的好朋友王丽莎在7月份是反工作组的，但是她好像就没有参加“主义兵”，起码不常和她们一起活动，倒是经常和我在一起到处看大字报，聊天传递各种消息。我那时对“主义兵”心存羡慕，觉得她们站对了路线，是革命左派。我没有反工作组，自然就不能参加主义兵，能参加的同学很少。

除此之外，8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的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我没有印象。我自认为是红卫兵，好像还是在“8·18”天安门广场大会前后，以后我才开始热衷于做袖章，到处乱跑，以红卫兵自居去参加关于“对联”的辩论，看其他学校的大字报，看大学里的批斗会。师大女附中除“主义兵”之外的大多数红卫兵应该和我差不多，自认为是红卫兵，但是也没有什么组织程序，也没有谁是领袖，只要自己出身是所谓“红五类”就可以自认为红卫兵。如果有一天被人揭发说你父亲有问题，被打倒了，那你就不能自称“红卫兵”了。

一般情况下，如果正式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都会贴出一张大字报，给自己的组织起个名称，就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战斗队”，还有后来大学里的什么“井冈山”，“公社”之类的，不会没有任何名称的。但是师大女附中在那个夏秋季除了“主义兵”，我不记得还有全校性的组织。“8·18”之后“红卫兵”们热衷于辩论对联，抄家斗黑五类，也有人在学校里批斗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但是做这些事不需要“有领导有组织”，那时候的时髦话语是“自己闹革命”，几个出身好的同学就可以结伴去“闹革命”，根本不需要谁来批准。8月底9月初因为外地学生强烈要求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毛就说让他们来，也可以让北京的孩子出去，这样就开始大串联，能出去的都跑出去了，学校里经常是冷冷清清没什么事情。

梁二同她们基本不在学校活动，我记得有一次在宿舍看见她们，也是准备开什么会，有什么事要内部商量，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所以，“8·5”事件和这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没什么干系，说“8月5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自己的校长”，这话至少不够严谨。”

（二）关于卞校长之死

1966年8月5日发生打死校长的事，那天下午我在学校，是个在场者。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几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中午我到学校，和同班同学王丽莎，高三2班的朱忠丹，李××（名字实在想不起来），我记得还有一个同学也是高三2班的，我们几个人在学校大操场南面宿舍楼的北门廊檐下聊天，那地方阴凉还有点风。那天天气很好，也很热，阳光灿烂。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高三1班的我会和高三2班的几个同学（当然都是干部子弟）经常在一起。我是上高二时转到师大女附中的，高一在杭州一中读书，到了上高三时，我在杭州读高一时的同班同学林平芬（林乎加的女儿）也随父亲调动转到北京，就在高三2班，这样我经常在下课时到隔壁2班去找她聊天，说几句杭州话，就认识了她们班的几个同学。另外，工作组撤后，实际上同学之间的年级班级界线无形中也消失了，几乎是看见谁就在一起说说话或者凑一块去哪里看看热闹，我和宋彬彬也是这样经常碰到一起说话聊天的。

正聊着天，我们就听见东边礼堂里有嚷嚷的声音传来，嚷嚷什么虽然听不清，但是那个时代不用听清也知道是在开批斗会，肯定是批斗校长老师了。因为无领导无组织，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今天有这个批斗会，就互相问：谁组织的？有同学说好像都是高一的小孩，不认识。知道某位同学是高一的但是不认识，这在学校里很正常。

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一队人从礼堂里出来，都是校长老师，旁边是继续吆喝的同学。我们就知道这是要“游街”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卞仲耘，然后是胡志涛，这两位（副）校长全校同学都认识，后面的顺序我记忆不准，但是我记住的老师是基本准确的，有汪玉冰，因为头一年秋天我们下乡劳动她和我们班同住一室，她很有趣；梅树民，他主管高中学生，特别是毕业班的事；还有教过我们的语文老师（姓李）和物理老师张继恒（大家习惯称她张先生），还有副校长刘致平，因为常年戴着帽子我记住了他。

在旁边驱赶吆喝的学生我一个都不认识，显然都不是高三或者中五（试验）年级的，有些孩子很小，看上去就是初一初二的孩子。

游街的校长老师手里拿着脸盆，搪瓷盆之类的，都是从食堂搞来的，还拿着木棍或汤勺，有的老师拿着簸箕笤帚，学生们命令他们一边敲着脸盆簸箕一边喊着“我是黑帮，我有罪，我该死”，旁边的女孩子们则嚷嚷着：“大声喊！”“快走！”

队伍从礼堂西门出来，顺着操场跑道向西走，走到靠近校门该拐弯时，有点走不动了，天气晴朗，在阳光下站着都感觉热。卞校长在最前面，我当时不知道她和胡校长头天已经被批斗并且挨打了，但是我早就听说卞校长身体不好，有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病，总之她首先就走不动了，步履迟缓，再说所有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心情肯定都是备受压抑，也不可能走很快，而且也不肯大声喊自己是黑帮等侮辱性的口号，这样，那些女孩子就不耐烦，开始动手打人了。

第一个动手的是谁我肯定说不出，因为第一不认识那些女生，第二我们只看到队伍的一边，但是我还有印象，一个比较小的女孩子夺过一个老师手里的棍子照着老师头上打去，很快，很多女孩子都开始夺过棍子笤帚打校长老师或者拳打脚踢，队伍开始乱起来。这时我们中有人说：“哎哟，打人了。”“坏了，打人了。”我们就跑过去。

跑在最前面的是朱忠丹和王丽莎，朱忠丹上前劝阻，但是无效；我站在王丽莎旁边，王丽莎拉住一个女孩子的手说：“别，别打人。”那个女孩子回头瞪了我们俩一眼，说：“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什么出身？”她的意思，如果你们是“红五类”就不应该同情“黑帮”，她这么一说，我们也没再说话，我们出身好，应该站稳阶级立场，同情“黑帮”，那岂不是不革命的表现？

我在学校里是个很不出色的学生，任何事都不会走在前面，所以我必须承认的是，当时我虽然没有伸一拳加一脚，甚至都没有说什么话，但是，我也没有任何劝阻的行为，我做了一个旁观者。

当时我看见宋彬彬在我们旁边，也拉住一个女孩子的胳膊说不要打人。我那个时候对宋彬彬印象很深，因为文革前她是学生会干部，工作组时期她也是学生干部，另外，宋彬彬是个很好接触的同学，你和她在一起没有高下之分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喜欢和她说话聊天，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也很容易就认识了。

我想把当时的情况再描述细致一些，以证明我为什么对宋彬彬印象很深，甚至记忆里觉得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那些女孩子开始打人时，游街队伍刚走到操场的西端快拐弯的地方，基本上还是由东向西的队形，我们是在南面宿舍楼看见的，所以跑过去时站在队伍的南边，北边也有打人的也有劝说的，我看见宋彬彬时，她在我和王丽莎、朱忠丹、李××我们旁边，具体说位置就是靠东边一点，当时虽然开始乱了，但是基本状态，我们几个人的所处的基本位置就是这样。

后来那些女孩子怎么把老师分散拉开到各处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住了几个场景。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的后代，我父亲虽然批评那条对联是“瞎说八道”，但是十几年我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仇恨和阶级斗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青年。即便如此，有几个场景还是跌出了我本不算高的底线，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印象里刘致平不常和学生打交道，他因为谢顶，常年带着一顶帽子。当队伍还没有完全散开时，有女孩子用棍子把他的帽子（解放帽）挑开，露出没头发的脑袋，女孩子们哈哈大笑骂道：“秃驴，秃驴！”有人就用棍子打他的头。

学校操场的北面是一排平房，我记得有几间屋子放着体育器材，篮球排球等，平房的东面是自行车存车棚，再往东就是一个厕所，紧挨着学校的北墙。胡校长就被一群女孩子拉到那个厕所去，那时的厕所很简陋，一排蹲坑，每个坑上面有一个带着长棍把手的木盖，防蝇隔味。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大乱，很多老师校工还是按照习惯每天上班，所以厕所还是打扫得比较干净的。胡校长就被命令擦洗蹲坑的木盖子。她被许多女孩子推来揉去，她上身是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衫，配一条很漂亮的黑色长裙，颜色很正，但是我看见时那黑色的长裙已被撕裂到腰部，露出了里面浅粉色的内裤。现场既没有抹布也没有水，不知道女孩子们要她如何“清洗打扫”，胡校长只好咬紧牙关用手指甲去抠那盖上黑色的污垢。就这样，女孩子们还是不依不饶围着她不停地连打带骂，几乎要把她推进茅坑了。

学校的南教学楼很宽敞，水门汀地面，我到那里时看见汪校长被逼迫搬着一个大花盆从二楼下来，那花盆直径40厘米左右，种着木本花，相当的重，本来是摆放在后花园里的，我估计是那些女孩子命令汪校长搬到南楼楼上，又命令她再搬下楼。汪校长比较胖，我想也是很疲劳体力不支了，下楼时步履蹒跚一步一挪，后面女孩子们也是连打带骂催促着“快点”！结果她还差几个台阶时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她整个人摔倒在地上，那不幸的花盆也“砰”地一声摔裂开来，女孩子们带着狂风暴雨般的叫骂声扑向汪主任，拳打脚踢。

太阳快落山时，有人告诉我们卞仲耘晕倒在后操场那儿。

我们到后操场去，在后门（朝北的一个门）附近看见卞仲耘瘫在一个平板车上，其状况只可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此时她躺在平板车上昏迷不醒，口吐白沫，白沫中还夹杂着粉红色的血丝，已经有出气没进气了。她身上铺满了大字报，黑字红叉一片浑浊，灰色的糍糊汤，和她自己昏迷失禁排出的黄色的秽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显然，在她已经昏迷倒地后，女孩子们依然不觉尽兴，往她的身上铺大字报（无非是写些打倒黑帮之类的标语），甚至把墨汁和糍糊汤泼在她身上。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同学和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从北门进来，男医生比较年轻，我印象里还带着眼镜（这一点不敢百分之百确定），女护士看上去有三十来岁，比医生年长一些，背着一个药箱，就是那时很常见的皮药箱，一个白色圆形里画着红十字；同学中我记住的有宋

彬彬和朱忠丹，朱忠丹是跟着宋彬彬等人一起去医院的。她们从学校后门进来后，宋彬彬等人和大夫说话，朱忠丹在一边悄声告诉我：在医院里找急救医生时，大夫一听说是抢救被批斗的走资派“黑帮”，还不愿意来，宋彬彬和他们争论说解放军抓了俘虏还给治病，这才来了两个人。

那个年轻的男大夫一看昏死者的样子，鼻子眉毛立刻全挤到一堆去了，口中念念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还有救吗？”宋彬彬说：“那你也得想法抢救，不能看着她死呀。”（这两句对话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女护士立即蹲下打开药箱，取出酒精棉给卞仲耘擦拭胳膊打强心针，用了很多酒精棉才从那肮脏的胳膊上开辟出一小块清洁地。我印象里打了两针强心剂都没有见效，卞校长还是昏迷不醒，医生说不行了，送医院去吧。同学找来工友，让他打水清洗一下，然后拉到医院去了。

把卞校长送到医院时，朱忠丹，李××和王丽莎有没有跟去医院我记不得了，我没有去，我在学校又呆了一会儿，听说医院传来消息，卞校长死了。

我听说卞校长“不行了”时，正在操场大门附近，现在回想也许我正打算回家吧，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一大帮疯狂的低年级女孩子几乎全作了鸟兽散。校长老师们都瘫坐在路边喘着粗气，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在哭，梅树民老师在低头忍着，惟有胡校长不流泪，她即使在喘气也是抬着头。当我注意到胡校长时，她也恰巧瞥了我一眼，仿佛在对我说：你在看我们受难。

那一瞥令我终生难忘，令我感到虽然仅仅做了看客也是有罪过的。

（三）关于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会和“宋要武”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据吴法宪回忆，大会的全称为“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据原解放军报的卢弘回忆，8月8日中央“16条”公布后，立刻有很多大中学校的学生老师跑到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去表决心，中央办公厅就在那里临时设了一个接待站，那天毛泽东路过时突然就下车去接见革命群众，说了几句话才离开。据说那句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记者根据当时毛的话加工整理出来的。有过这一次突然性的接见，才有十天后更大范围的群众大会和接见。

我个人认为大会的组织者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组织大会的，以往这样的群众大会很多，虽然是群众大会，也还是有组织的，按照惯例就是群众都在广场上，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面，下面东西观礼台也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进入，从来没有群众或青年学生可以跑到天安门城楼上面去参加大会的。如果说那天有预先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去的恐怕就是一个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她是北大附“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领袖，口才很好，被安排在大会上代表红卫兵小将发言。至于后来上去那么多学生，红卫兵，那都是临时决定的。

参加那个大会是谁通知的我也不记得，模模糊糊记得学校里还是有老师在召集，可能也是出身很好的老师吧。刘进、宋彬彬她们成立的“筹委会”我没印象，因为我也不是学生骨干。

“8·18”那天去广场很早，我们学校所在的位置离天安门很近，就在金水桥前面，我记得当时我们前面没有什么人，很空旷，看城楼上面很清楚，上面有几个工作人员在走动，因此我们也是兴奋得不得了，觉得今天肯定能看见毛主席了。后来广播通知几个学校各

出40名学生到城墙下时，谁也没想到是上天安门。宋彬彬就看着本校的学生点名，我们班我和王丽莎、张小青被点到，我看看被点名的部分是高中生，个子比较高，家庭出身就不用说了，实际上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都是出身好的学生。

有人问：“哎，去干什么？”我记得是宋彬彬回答：“不知道啊，大概是当标兵吧。”那个时候，开群众大会或者沿长安街夹道欢迎来访的国宾，都要选派一些个子高、身体好的学生站在前面当标兵，隔几米站一个，提示后面的人不能超出这个界线，我到北京后参加过好几次夹道欢迎国宾的事，几乎每次都被挑去当标兵。所以那天挑人的时候，宋彬彬很自然地按照这个条件来点名，初中的孩子尤其是初一的孩子被点名的很少，我记得有张小艾，她个子非常高。

到了城楼下面集中后，一个穿军装的人笑呵呵地就带着我们进了城门，然后我们向右拐上坡道，这下我们就知道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了，那个兴奋劲就不用说了。我自己高兴地东张西望，看见右边有个摄影师在拍片子也兴奋地告诉旁边同学“拍电影呢”，指指点点地也被拍进了镜头。

上了城楼我们被安排在东边空地上，还有一部分学生在西边，我站在墙边往下看，看见下面东西观礼台上也站满了学生，很多都是穿军装的，他们看见了城楼上的学生，就一起高喊“我们要上天安门！”“我们要见毛主席！”有的学生激动得要哭，我心里自是幸福骄傲得不得了。大会开始后，林彪讲话，彭小蒙发言我们都没好好听，就是不断地喊叫“我们要见毛主席”，其间也有一些领导过来看看我们，但是我们就是最想看见毛主席。这样就有人想方设法钻过警卫的设防跑到观礼台中间去，我和王丽莎听说宋彬彬、张小艾（还有一些同学）已经冲到中间去了，但是这时警卫战士也开始严防死守，不然我们也想溜过去看看。周恩来来到两边安抚大家，告诉说毛主席一会儿会来看大家的。又过一会儿，毛主席果然来了，身边一个小护士和一个高大的警卫员，我们全都挤进过去握手，蜂拥一团。

我后来听说，红卫兵能上城楼，缘于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当时一高兴，说了一句：“让娃娃们上来嘛。”不过这只是听说。另外，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她们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戴袖章，戴红领巾，也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如果有事先的计划，根本不可能随便让各校现场挑几个学生就上去了（上城楼的有一千多学生），无论如何中办、警卫局也要事先通知各校备选的条件、注意事项等等，这是常识。毛泽东本人也许心里早有计划或设想，但是他就是喜欢搞突然袭击。7月底，人民大会堂的大会他突然从后台走出来，8月8日在中南海西门一高兴就下车去接见师生，包括“8·18”那天穿正式军装，他都是突然决定。当时城楼上有点乱，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才会被一些学生钻了空子跑到中间去，不然，肯定不能谁想过去就过去的。

从城楼下来后，很多同学都羡慕死了，有一个初一的孩子就搂着张小青的肩膀直哭。但是到了那天下午，学校里出现一张大字报，说张小青的父亲张明远是高岗集团的“五虎干将”之一，她有什么资格上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云云。我们看了大字报也无话可说，张小青自己也只好低着头回家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没什么严格的组织程序，谁要是被揭发说父母有问题，自然就不能说自己是红卫兵，连讨论都无需讨论。张小青早上还被宋彬彬挑选到天安门城楼前集合，下午就被人说成是黑帮子弟，这只能说那个时候变化万端，令人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最后，坦率地说，“8·18”这样一个群众大会，确实是后来红卫兵们从开会批斗“走资派”“黑五类”发展为肉体摧残的一个催化剂；能上天安门城楼见到毛主席，也是我后来积极参与“辩论对联”，抄家，斗地主，甚至还用皮带打了“地主婆”一下（还好因为

胆小没打出效果)的巨大动力。所以如果说“8·18”之后,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暴力的、人性丧失的阶段,那么最高的、幕后的指使者是谁,是不言而喻的。

“8·18”之后,我,我所认识的同学,并没有认为宋彬彬从此就改名“宋要武”了。就是报纸上登出了那篇文章,就连我这么愚钝的人也觉得那是为了文化革命的宣传需要。我没觉得宋彬彬已经改名了,我也没觉得毛主席就是要给她改名。

我是8月底就开始跑到外地去“串联”的,中间回来休息几天,找到几个好朋友又结伴出去。这样,一直到1967年军训前,我没有再看见宋彬彬。1966年的国庆节我是在兰州度过的,10月初我回北京,临时结伴的同学散了,有几天我也找不到熟悉的同学好朋友,很无聊。那时候学校已经很冷清了,有一天到学校没看见熟人,就在传达室窗口外面注意到一个纸箱里全是寄给“宋要武”的信,还有几封刚到的放在窗台上,有些信已经被拆开过,也有些没拆。传达室的王大妈,胖胖的,嗓门很大,是个很负责的校工,我和她闲聊几句,知道这么多信都没人接,宋彬彬不承认自己是“宋要武”,所以就不接信,因此这些信就堆在窗口随便哪个同学来了都可以拆看。那天上午我就在门口拆信看,拆了不少,但是也没有封封都看,说实话根本看不完,也没多大意思。

信的内容基本上两类,一类是向“宋要武”表示致敬,学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云云,一类是向“宋要武”汇报他们那里文化大革命如何遇到挫折了,走资派或保皇派如何压制造反派了,希望“宋要武”能去支持他们。但是有一封信被我记住了,那是从武汉一个什么学校寄来的,信中说,“宋要武”在武汉发表言论支持保皇派,保湖北省委,“我们革命造反派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还有其他很多话,有一句大意是“希望你悬崖勒马”,这是那个时候很时髦的词语。这封信给我留下两个印象,第一,宋彬彬去了一趟武汉,第二,她在武汉做了“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

这些信不是我首先乱拆乱翻的,在我注意到之前,已经有很多被其他同学拆开看过了。这说明,在学校里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并不认为宋彬彬就是“宋要武”,不然,至少从同学间的友谊出发,我们不能、也不会私拆别人的信件。

毛泽东确实一贯号召我们要武不要文质彬彬,在文革爆发之前,我们经常背诵的一首诗就是“不爱红妆爱武装”。暴力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对于文革中红卫兵所作所为最具影响力的,其实并不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几次学生,更不是一句“要武嘛”,而是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的这篇文章在文革前几乎是每个中学从初中到高中都要学习的,是对青少年进行政治教育的必读教材。那里面的很多话语,后来成为红卫兵施暴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谈“所谓‘过分’的问题”,毛在文章中明确地说:“矫枉必须过正”。还有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的语录,当时几乎人人都会背,人人都要背。在被关押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每天都要背诵的语录中,这也是必背的一条。其目的是教育他们正确看待群众运动。我甚至记得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里,也引用过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一次广场上的大会,一次接见所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但也只是一种诱发因素,而十几年的暴力斗争教育,对“敌人”的仇恨教育,才是文革初期暴力行为的思想基础。看不到或者回避这个思想基础,只是在“要武嘛”三个字上做文章来探讨追究文革中暴行的根源,那真是舍本逐末。

最后,我借此机会向1966年8月5日下午在校园里被殴打、被侮辱、被残害致死的校长老师表示我个人的道歉。虽然我没有加入到打骂老师的行为中,但他们是教育过我的老师校长,在他们受难时,我在一边旁观。

□ 来源：作者多年前曾在北京“三味书屋”做过 8—5 事件的演讲。本文发表于电刊《记忆》2010 年 4 7 期

~~~~~  
【乱世人生】

死去的父亲也难逃厄运

• 王佩民 •

父亲王孝和（1924 年—1948 年）浙江鄞县人，出身于上海工人家庭。1938 年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学习，结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读了《红星照耀着中国》等进步书刊。民国 30 年 5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民国 32 年 1 月进杨树浦发电厂发电管理室当抄表员，他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工人人们的贴心朋友。民国 35 年 1 月，上电爆发大罢工，他始终积极参加，赢得工人人们的信任和拥护，当选为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支会干事，分工负责工会的文化、组织和文书等工作。在读书会基础上，他建立了工人图书馆，为工会会刊写稿。由于上电工会在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于民国 36 年 9 月宣布解散上电工会，通缉工会干事。经过工人斗争，民国 37 年 1 月召开大会选举工会干事，王孝和等仍当选为常务理事。国民党又派出特务以“指导员”、“秘书”等身份驻在工会进行监视，并威胁利诱他参加国民党。他以“对政治不感兴趣”加以拒绝。民国 37 年 2 月，“申九惨案”发生，他代表工会参加“申九惨案后援会”，在厂里发动工人缠黑纱、捐款，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同年 4 月，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工人和学生的民主运动，以破坏生产和社会治安等名义，在全市逮捕各厂工会负责人。19 日，特务万一闯进王家要他自首，遭到拒绝。他妻子及好友要他到乡下暂避，但他考虑到党和工会的安全仍留下来。21 日清晨被捕，他经受酷刑考验，保卫了地下党的秘密和战友的安全。6 月 28 日，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判处王以死刑。上电党组织指定专人帮助王妻上诉，狱中党组织也帮助王研究上诉内容。各界人士纷纷向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寄送抗议信。9 月 24 日，特刑庭维持原判，王在狱中写了三封遗书：一封给双亲；一封给怀孕的妻子，要她把孩子抚养成人后告诉他父亲是怎样死的，“要继承父志，完成未竟事业”；一封给狱中难友，号召战友们“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9 月 30 日上午，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押赴刑场时，高呼“特刑庭乱杀人”，时年仅 24 岁。

◇ 我所知道的父亲

我妈的娘家就在我爸外婆家的隔壁，所以他们是大人做媒的。按乡下常规，订了婚的女儿到 15 岁，男方就要送聘礼，16 岁正式结婚。父亲一直在上海读书、工作，一直到妈妈 18 岁那年，妈妈家既没有收到聘礼，也没有父亲的消息，双方大人都很着急。以后才知道，父亲在上海听人说妈妈在乡下既信佛又嗜赌。他曾写信给他的表妹（因我妈不识字），大意思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由父母作主的，就如一盘菜，你不喜欢吃而要硬吃下去也会吐出来的。他表妹接到信后却没有转告我妈。旧社会，姑娘订婚后被夫家退婚是很不光采的，邻居会认为姑娘一定是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在背后会有许多闲言闲语。外婆仅一个独生女儿，知道此事后心急如焚，但此时做媒的父亲的外婆已经过世，找谁去呢？就在妈妈 19 岁那年（1946 年），外婆带着妈妈来到了上海。

父亲王孝和此时已是共产党员了，在个人的问题上他也服从组织的。有一次约会，父亲让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在对面马路看看我妈，那位领导同志看了后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工作。我爸很听话，组织说什么就是什



么，父亲决定娶我妈妈为妻。2个月后，父亲与母亲结婚了。听从组织安排，父亲报考了海关、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结果3个单位都录取了他。家里人认为邮电局是“铁饭碗”，去那里工作比较好。父亲自己很想去海关工作。但最终他还是请示了党组织。考虑到上电是个动力部门，需要加强力量，党组织希望他去上电厂。父亲毫不犹豫地听从了党的安排。1943年1月，进了杨树浦发电厂，在发电厂的控制室当抄表员。那时候电力公司、邮局，还有海关，都是好地方，他就是用外文去应试的。我爷爷以前在太古轮船上（太古轮船是一艘外国船）烧煤的，因为每年夏天要生病的，外国老板就把他踢出来。我爸到海关去与他们交涉，由于英文不懂，他受了一肚子气，所以他发誓要学英文。父亲读英文的学校就在思南路皋兰路那里（二工大后面。现在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了），学校的学费相当贵，都是有钱人读的。为了完成学业，他半工半读（上完课后打扫教室）。虽然被有钱人家看不起，但他书读得相当好，都是第一、第二名。他也是在这个在这个学校入党的。父亲是1938年进校的，一直读到1941年，但最后并没有毕业。组织上让他去电力公司，就是想让他加强工人运动。

#### ◇ 父亲被张春桥定性为“叛徒”

没想到，死去的父亲也难逃厄运，被诬陷为了叛徒。

1965年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利用国民党特务强加于父亲的伪造材料，以市委名义报请中央不再宣传父亲的事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铁道学院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说我爸是假烈士、真叛徒（到现在这份东西我还保存着）。之后，我爸就变成了“叛徒”，而且传说很多很多，还有说我爸是潜伏特务，没有死的。我妈那时候住在杨树浦，杨树浦邻居都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到我家来问我妈，我爸是否还活着？我告诉他们是她亲眼看到我父亲落葬的，怎么会活着？但外面传说活灵活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在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先驱者之歌》时，率先在银幕上重现了父亲的英勇形象。

我就觉得他们胆子很大。

解放前，我妈是家庭妇女，是不知不觉地帮我爸做事。她没文化，搞不清楚什么事情，但她知道我爸是好人，不会做坏事。后来我妈特批离休的，专门有两个地下党干部为她做证明。我父亲被捕后，地下党等于暴露了。地下党不能做的事情，都由我妈出面做。我妈以她合法的身份到监牢门口去吵闹，要国民党把我爸放出来，说国民党不讲道理，把无辜的人杀掉，引起民愤。这是地下党要做的事情，但地下党不能出面了，我妈出面名正言顺，我妈起了地下党不能起的作用。

杨树浦发电厂是美国人开的。我爸牺牲以后，据说厂工会与美国人结过帐，每个月按照大月小月发工资，我爸工资照拿，说是养我们两个人到18岁。文化大革命时，钱全部冻结了，我们生活费也没有了。我爸当初被捕时的罪证是破坏发电厂（说是共产党要借他的手破坏发电厂）。他刚被抓进去时，有人证、物证。国民党就是用这个借口抓他。说他叛徒是因为被抓进去以后审问了，我爸承认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候地下党没有对他说你不能承认，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就承认了。据我的分析，后来大概地下党转达给他说你的情况特殊，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快点再翻供。因为地下党的人说我爸没有承认过，我觉得张春桥可能就利用这一点。

我是在整理我爸材料时发现了这件事。实际上那时候发电厂是不会引起全上海一片漆黑的，只不过是厂里受到一些影响。解放前夕，地下党想要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想要弄点事情出来，所以想在厂里引起一些大的运动。我爸始终没有承认共产党破坏发电机，这是历史造成的原因。我爸最后牺牲时，他的身份也不能说，只能作为一般老百姓，所以他的案子很特别、很难说。张春桥说不要宣传，说我爸不是烈士，说他有变节行为。

我到市档案局查到我爸从监牢写出来的46封信。我妈没有看过这些信，因为我妈解放前是不识字的。这些信都是我爸亲笔写的。我是通过我中学同班同学马长林（他是档案局局长助理）看到我爸的亲笔信件。我曾想问他要回这些信，他说信不能给你，除此之外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我就复印了两套，并把复印件全部装订好。我爸的字比较潦草，所以我将信件全部输入电脑打印出整理好。到2003年，我爸的一些在世的老同事，我也基本上都采访过了。

沈鸿春（音）是我爸的上级，是他跟我爸联系的。那时我爸实际上是可以走的，上级已通知沈鸿春（音）了，让他通知我爸撤退。发电厂事件是4月1日，我爸是4月21日被抓进去的，中间有3个星期的时间。但我爸始终没有接到上级叫他撤退的通知，他组织纪律性很强，他就是不走。解放后，每次扫墓，我姐看到沈鸿春（音）就骂，因为我爸的命就因在他手上拖了一拖。问他为什么拖？他说交通员没有找到，撤退到哪里去不知道。

我爸的老家在宁波的小普陀，我去年去过一次，老家的房子一面山，一面水，躲个人，根本找不到。我妈曾是跪下来求他快点逃，但父亲就是不走。19日国民党特务头子万一（音）来了，他说我们政治上走的是两条路，他说，我和你是兄弟，你快点老老实实坦白。这个人是厂里工复委的特务，我妈预感肯定要出事，当天晚上她又劝父亲快点走。那时候走，可能走不掉，也可能走掉了。父亲第二天又去上了一天班。19日晚上，父亲和我妈谈了一个晚上，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他也肯定知道自己要出事了。他讲第二天上班假如出来怎么样，不出来又怎么样，一一和我妈交代清楚。21日他早上上班时果然被抓了。1日到21日，3个礼拜，父亲完全有机会可以逃掉，但他就是不逃。

沈鸿春（音）后来一直在厂里，文化大革命时也挨整了。他活着的时候，每年都去扫墓。我那时候很幼稚，但我姐看到他一次就骂一次。那个特务万一（音）后来是在监牢里死的。那晚，我妈是跪下来求我爸逃的。那时候她肚子正好有我，不时会有反应。我爸还问她生什么病了，要去看了。父亲关在牢里时又问我妈，我妈说怀孕了。我妈一直哭，我爸说你不要哭，应该开心，你做第二个孩子的妈妈，我做第二个孩子的爸爸了，我爸很乐观。

我爸一直到1988年才平反。“四人帮”粉碎后，我爸活着的同事觉得能够活到今天也不容易，父亲被抓进去以后，没有出卖过一个人，没有出卖过组织。他们给我父亲动刑时，肋骨都打断了。我妈第一次去看父亲，都不认识他了，人完全变了，身上都是血。但我爸还笑嘻嘻对着我妈。我爸被抓进去前，很多事情都关照好的。他说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人家，到我们家里来的是谁。他说，如果你说了，对我没有好处，只有不利。父亲被他们抓了以后，一次母亲到厂里去吵，正好碰到万一（音）。万一（音）就让我母亲看看有没有谁认识？他说，以后你家里生活成问题，钱我就叫认识你的人给你送过来。幸亏父亲关照过母亲，否则就会被他骗了。我妈看到很多来过我家的人，但她说我一个都不认识，就认识你一个。事后其中有一个人看到我妈时说，我的命就在你的嘴巴里，只要你一说出来，我就完蛋了。由此可见我爸做事是很地道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爸没有出卖过一个人，连和我爸单线联系的人到现在还在，他说假如出卖的话，我第一个被抓进去（这个人是我爸的下线）。我现在还和他保持联系，把他当自己爸爸一样，逢年过节就去看他。张春桥说我爸是叛徒，可能就是他刚被抓进去的那段时候（他们打他，而且还有人证、有物证，所以父亲可能承认过自己是共产党。后来地下党开会，说你的身份不能暴露，马上翻供）。父亲到底有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有人说，他的手印是昏过去时按的。

我父亲1965年以后就不能宣传了。父亲没出卖过一个同志，当年跟他一起工作的老同志觉得现在自己在享受待遇，而我父亲王孝和却牺牲了，都觉得于心不忍。所以他们写工人运动史时，专门组织了一批人，调查我父亲这段历史。他们弄清楚以后一直上报到市里。1988年，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电力局的陈局长和江泽民是同学，我们通过他的关系找到江泽民。结果，在我爸牺牲40周年时，他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1965年的那个文件随之撤销。1988年9月29日由中共上海电业委员会、上海市工运史料委员会在延安西路200号上海文艺会堂召开了《王孝和烈士就义四十周年纪念会》，会上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同意恢复宣传王孝和烈士事迹的复函》。市顾委、市总工会、团市委等有关方面领导及各界代表400余人参加了纪念会。江泽民那天正好在中央开会，他也给40周年纪念大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复印了下来。

父亲牺牲后，是在国华殡仪馆举行大殓的。1949年5月还开了一个很大型的追悼会，大概有20000人参加。追悼会以后，父亲葬在虹桥公墓。我们每年扫墓，那里有一间很简易的草棚，接待我们，放点水果、点心。每次相关领导都会家属接见，问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后来，他的墓迁到上海烈士陵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可能去敲过我爸的墓，但那时候墓地已经空了。外面传说我爸的墓都被掘掉了，实际上并没有掘掉，而是正好转移了。我去看的，我爸的棺材很好，一点都没有烂掉，我们在外面套了一个水泥棺材。里面的棺材仍然很好，我爸的名字还很清楚。我曾要求打开看看，但没被批准，说不能打开。

父亲的墓从上海烈士陵园搬到龙华烈士陵园时，因为龙华烈士陵园是是将遗骸放入宜兴坛子里的，所以要开棺。我听说之后，马上对墓地的人说，我爸活着时我没有见过，看看尸骨也好。那天就我一个人去（我妈不敢去）。可惜我那时候没带照相机，也没有这种意识。陵园的同志他们拍了几张照片，但并没有拍棺材里面。开棺一看，里面就一个头颅，两根长骨头；棺材是空的，衣服都没有，全都风化了，但棺材还是好的，里面很干，有石灰，不是很多。我想，自己没有看到过爸爸，我看看骨头也好。

地下党这批人，比在战场上牺牲的人还要不容易。战场上的人死是被一枪打死的，而地下党他们是一点点受折磨而死的。他们在生活中，天天神经很紧张，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我妈说沈鸿春（音）真的就是拎着一个包，随时随地准备在外面过夜，生活很不稳定。

我妈说，如果我爸活到文化大革命，也会被人整死。父亲比我大24岁，假如活到现在，应该有80几岁。当年介绍他入党的许统全就是被迫害致死了。“文革”中，他实在受不了，有五六顶帽子戴在他头上。他后来是打入中统的地下党员了，我父亲出事那会儿，他还到上海来救过我爸，但是没有救成。我爸的案子，后来大概是蒋介石过问的，问这个案子怎么样了，到现在没有口供？他指令9月30日之前要弄掉我父亲（我是后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

◇ 姐姐因父亲罪名无法参军

我的家倒是没有人来抄过。但我姐分配时却遭遇到很大的坎坷。我姐是（19）66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总政歌舞团到音乐学院附中来招生挑了5个人，说这5个人我们总政要了。但因指标还没有批下来（他们单位是不是可以招生还没有批），他们怕晚了要不到人，就先要了5个人，其中就有我姐姐一个。等到名额下来，他们对我姐审查后，说我爸是叛徒，不能批准她入伍。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姐就到音乐学院去了。总政不能要她，战友文工团也不能接受她（凡是部队都不能要她）。战友文工团是北京军区的，我姐夫那时去了战友文工团工作，而我姐被分配到了人民机器厂里。但阴差阳错，由于名字搞错了，她结果也没去成，只能在家里待分配。有时她去上海海港剧组帮帮忙，拉拉琴。

后来山东省《奇袭白虎团》来借人，就把我姐借到了山东。我姐夫是在战友文工团（在北京），他们两人分居3年，我姐一直想过去，却一直过不过去。到了山东后，江青说8个样板团全部要到北京去集中管理。我姐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也过去了，她可以和姐夫在一起了，而且她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但待了一年不到，山东人在北京待不惯，吵着要回来，整个团全部又搬回山东济南。我姐户口也迁到了山东。结果他们夫妻俩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北京。我姐真的很苦，1975年，我姐夫查出癌症，姐姐、姐夫结婚3年后，姐夫就因病去世了。姐夫得的是肠癌，年头生的病，年底就去世了。因为我爸是“叛徒”，姐姐不能到部队，他们夫妻一直分居。姐夫生病时，姐姐被借到北京工作。姐夫去世后，她仍借在北京中国京剧团。人虽在北京，但户口还在山东，工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想调回上海，也一直没有落实。1977年，姐姐在北京，我母亲打电话问她上海联系得怎么样？我妈告诉她还没落实。姐姐在电话里很失常地说算了，我没有路可走了。我妈接到这个电话，急得不得了。那时“四人帮”已打倒了，但我爸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为了我姐，我妈到市革会去哭，说她没办法了，豁出去了。我妈说她丈夫为革命牺牲了，现在女儿发生这种事情却没有人帮忙，在北京走投无路，我怎么办？里面接待的人怕影响不好，把我妈拉进去问我妈，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我帮你解决。因为母亲这样一“闹”，我姐调回了上海。那时已1977年。我想姐姐的事肯定经过市领导同意的，但那时候我父亲的事迹还不能宣传。

我也是老三届的，分配工作是上中工宣队一手安排的。可能是因为我父亲在他们心中有很深刻的影响，工宣队对我蛮好。将我安排在了上海工矿。

1968年，我被分配到在虹桥路的上海电讯器材厂，做电话机。当初是把我分配到仪表局下属的26厂，上讯厂拿材料的人看到我的材料后，就把我弄到了电讯器材厂。我还属于比较稳当的，没有算叛徒子女。后来听我妈说，她厂里就不用她，因为上面有关照，不能用她。所以她一直是厂里的技术员。

“文革”期间，厂里应该说对我蛮好的。我们支部书记思想有些左，我经常会对他提意见，他好像对我有些生气。我很直爽，看到什么事情不对就要说，可能他觉得我对他不大好吧。我们几个同事在说，照理说工农兵大学生选拔应该选你。但当初地下党本身就受不到重视，地下党的子女怎么可能受到重视？而且我这种人太直了，不大讨有些人喜欢。

我妈曾对我说，你们以后生小孩，要有一个姓王的，还一直灌输我以后要生两个小孩。

我是1974年结婚的，1977年有了大女儿。之前，我一直习惯性流产，这个大女儿硬是被我保住的。1978年我又怀孕了，我想生下来算了。结果厂里叫我弄掉。我很老实地告诉他们，我一直是习惯性流产，好不容易有了，我想生下来。那时候是可以生两个的，但一定要间隔4年。我说你们就看在这个份上，让我生下来算了。你们假如觉得不能交

代，我在组织生活上做检查吧。但厂里一定要我做掉，我那时已怀孕七个半月了，我说我不做。

我在组织科做事，组织科科长是一个离休干部，他对我很同情，先让我去了工宣队，回来以后就分在组织科，等于是从车间跳出来了。为了我二胎这件事，又把我发配到金工车间去劳动。但两个老师傅对我很好很好，不叫我做什么事情，就叫我坐着。后来他们还让我教教他们数学。我待在厂里觉得没劲，就要求调出来。后来我调到了仪表局测试所。他们那时正好要一个人事干部，我就去了。

父亲王孝和在文革之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榜样，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工人师傅的心中。尽管文化大革命遭“四人帮”的诬蔑，诽谤，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文革之后，为他平反昭雪，说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是勇于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的。

□ 来源：《中学生的文革岁月》第一集

~~~~~

【亡灵祭坛】

白桦：还卜琴父以美丽

• 林 渊 •

〔原编者按：二〇〇九年十月号《春城往事》中曾提到文革中的英烈卜琴父惨案，但不知其详。感谢王云龙导演不辞辛劳，终于将这野兽般的暴行公诸于世。“还中国以真实，还卜琴父以美丽”！文革魔影迄今未散，中国还有多少林昭、张志新、卜琴父的冤魂在哭泣？）

继《寻找林昭》、《我的母亲王佩英》后，再有摄影师以纪录片展现一名刚烈女子，在文革中因批评暴政而遭虐杀的惨案，受害人名叫卜琴父，十八岁就加入解放军，她不为外界熟悉，但有人对她的案情讳莫如深，至今仍拒绝公开真相，只说她“因公死亡”。

导演王云龙花了近十年时间走访众多知情人士，遇到不少拒绝回避，甚至质疑，一度心灰意冷，但曾与卜琴父一起工作的著名作家白桦接受他访问时喊出：“还中国以真实，还卜琴父以美丽”，使王云龙深受鼓舞，决心为历史留下见证，这宗被掩埋四十多年的血腥荒谬事件终能渐见天日。

◇ 昆明军区女演员公开反对文革

卜琴父原名卜莘云，湖南醴陵人，一九三一年生于农村，父亲早逝，有一姐一弟。据其弟称，卜性格刚烈，有正义感，少时已有小钢炮之称，日军入村时曾挡在敌人军刀前舍身救母，使日军感动得下不了手。十八岁时曾在国民党文工团的演剧队工作过两个月，后转投中共贺龙的部队，辗转成为昆明军区文工团的话剧团演员，丈夫是原籍广东的马汉昌，为昆明军区歌舞团的首席大提琴手。导演王云龙于一九五九年以十六岁之龄报考昆明军区文工团当学员时，遇上时任文工团教员的卜琴父。卜的亲切热诚，及经常激励学生奋发向上，令王云龙留下深刻印象。

卜琴父在演技歌唱各方面都表现出色，唯因身形娇小，无法在剧中担任主要角色，但她依然敬业乐业，认真做好每个角色，又乐于助人，多次被文工团评为“三好团员”，曾与她

共事的人都对她赞口不绝。现年八十岁的白桦在五十年代曾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他形容卜琴父为人单纯正直，正因如此，才不知避险而犯险惹祸。

文革爆发后，卜琴父于一九六六年九月被捕，不久送入精神病院，昆明军区直属军事法院在六八年以反革命罪，判处卜琴父有期徒刑十五年，开除军籍，投入当地监狱。据悉因卜对文革十分反感，公然写大字报指责中央政策失误，反对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反对改组北京市委，为吴晗、杨献珍和周扬鸣不平，又指姚文元是自动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她还到话剧团专门张贴大字报的大礼堂，动手撕毁“革命群众”的“革命大字报”，甚至扬言要把大字报房烧毁。

同期因反革命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昆明军区文工团女团员还有当时团中的名演员钟耀美和赵彦，二人饱受折磨，最终熬过文革的黑暗岁月。现时她们已年近九十，虽然往事不堪回首，仍勇敢地面对王云龙的镜头，痛陈当时精神病院和监狱内的种种不人道惨况，包括脱光女犯人的衣服来羞辱她们、吊在树上毒打、强迫犯人吞下令人神志不清的药物、只供应报纸给女犯人当卫生巾使用。

◇ 临刑前反抗批斗，被割舌惨杀

可是，卜琴父无法像她们一样，还能亲述自己在精神病院的可怕经历。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于一九七零年五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卜琴父死刑，终年三十九岁。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当年的联合公报指：卜琴父，反动地主家庭出身，国民党演剧队队员……猖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狱中大唱国民党反动军歌，气焰特别嚣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曾在大街远处目睹卜琴父被押往刑场的王云龙记得，当时卜的口中塞着滴着血的毛巾，他顿感震撼万分。近年他多番追查，找到宣判大会上的工作人员，才知道卜琴父当年被拉进宣判会场时，最初还不清楚大难临头。当她知道自己快被枪决，就叫嚷起来，很快便有人冲上去捂住她的嘴，她拼命挣扎，有人指示士兵用手中的枪刺直捅她的嘴巴，绞断她的舌头，顿时，鲜血直冒，惨不忍睹，但卜仍在叫喊，有人就找来铁丝勒住她的嘴，又有人找来一条白毛巾塞进她嘴里，断绝了她的声音。那条毛巾很快就被鲜血浸透，她的头则被死死地按在地上，宣判大会才得以顺利进行。

直到一九八零年五月，卜琴父才得到平反，昆明军区军事法院宣告她无罪，恢复军籍。可是她的遗属仅收到一张“因公死亡”通知书。卜的独子马渝那年正在四川音乐学院念书，他表示：“话剧团的人把关于抚恤金的文件拿给我，我一看写着‘因公死亡’，没有写‘烈士’，也没有‘烈士证明书’，我就不签字。”

之后，卜的遗属，包括在她被捕不久便跟她离婚的丈夫马汉昌，多次向文工团申诉，指卜琴父的事迹较张志新的表现还站得高，应该追封烈士，并宣传其事迹，可是被昆明军区政治部拒绝。一直想为母亲讨回公道的马渝无奈地说：“军区党委一级、政治部党委一级都没有人帮着说话。母亲明明是被枪决的，怎么现在连怎样死的都没交待！实在太黑了！”

◇ 苏策、高音谴责文革六四的镇压和退党

一九八七年因大裁军而转业到电视台工作的王云龙，一直对卜琴父的惨死难以释怀，进而深刻反思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他和妻同心协力，克服不少困难才完成的纪录片《还卜琴

父以美丽》，除了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卜琴父惨案，还令笔者大感意外的是，结尾时访问的两位老人竟从文革畅谈到以后的事件。

曾被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又被投入监狱八年的知名红军作家苏策表示，历史是绕不过去的，但现阶段还不是适当时候设立一个文革纪念馆。另外文革要设纪念馆就会引发其它问题，那历次害人无数的政治运动，以至六四事件，又要不要也设纪念馆呢？六四是邓小平下令开枪的，共产党会否承认这个责任？

另一位老人是曾与卜琴父同事的文工团小提琴手兼政治指导员高音，他带点激动地说：六四枪声一响，自己才彻底醒悟过来，这个党已经不是我年青时候所追求的党，它不再值得我尊重，所以六四之后，就决定退党！

这是大陆纪录片罕见地直接展现有关六四事件的言论，而且苏策、高音二人是体制内的退休干部。王云龙曾询问高音要否删掉退党的言论，高音却说让越多人知道越好，自己已活得差不多了！

更特别的是，此片去年十月参加在南京大学举行的民间活动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展，获评为十佳纪录片之一，今年四月又在广州的独立影像活动放映了两场。可说是大陆民间纪录片的一次大胆动作。

□ 来源：《开放》（香港）杂志 2012 年七月号

~~~~~

## 【劫后反思】

### 校友热议樊思清忏悔（下）

• 孙怒涛整理 •

（上接 z k 1 9 0 7 a）

### 三、关于忏悔是否公开、是否见被害人家属的讨论

▲ 林海：我不赞成把樊思清同学的发言扩散到群外，即使改成化名也不行。因为使用人肉搜索，很快就能找到真实的名字，找到他的家人和亲友，他们的住址、工作单位和电话，甚至他们的银行卡。这样就会对樊思清同学和他的亲人、朋友造成极大的困扰。这种困扰是超出法律范围的损害。

我也不赞成樊思清去见家属。我预见这样做会给樊思清和他的亲友带来伤害。至于到底要怎么做，决定权在樊思清自己手里。

有人会反问，缺少了这个实例，文革的反思不深刻怎么办？反思文革要抓住的重点是奴化教育和个人崇拜，是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是蔑视人权的阶级斗争，是现在还在涌动的那股洪流。

▲ 陶世龙：清华两派当年严重对立直至残酷，正因此今日的和解意义特别巨大，特别在这社会继续撕裂，呼唤再一次文革之声甚嚣尘上之际。其中一些文字和图片公开出去不会伤及个人而对社会有良好影响的，经本人及有关当事人同意，还是应该传播出去。

▲ 王普：我还是觉得，樊思清的文章将来不宜对外发布，一定要发也不要实名。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外人就难说了。

▲ 钱久业：樊思清的忏悔今日公布于众，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通过忏悔，倾诉得到解脱，心灵得到升华，同时也得到同时代校友的尊敬和谅解，作为同时代的校友，我们也要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考虑周全，最大限度使他有个安宁祥和快乐的余生，亲人不被打扰。

▲ 梁颂辉：樊思清，你的忏悔是真诚的。我也赞成只在此小范围内，不要公开发到社会上去。文革我们都是受害者，也是不同程度的加害者。更需要忏悔而没忏悔的人多了去了。整个社会不许反思文革，谈何忏悔的社会大环境。也只能在群里这样的小环境里披露我们的心路历程，给后人留下一点资料。

▲ 李子壮：忏悔是个人的事。基督教的忏悔是对上帝（牧师），是私密的。到了俄国知识分子那里，变成了公开（东正教）骂自己——比如《复活》。到了中国，就是大会检讨（认罪）。一公开，就有人拿来说事。所以，樊思清是很难很难的。某某可以要求公开道歉，但不能要求别人公开忏悔。而且，的确公开的忏悔里有把最该忏悔当功劳的，或嫁“过”于人的。比如聂佛爷。我认识的风云人物，公开道歉的后来都挨骂，无关的人还特别义正辞严。所以，一定不要扩散。

▲ 孙怒涛：樊思清在本群公开忏悔，我们作为他的校友，肯定他，鼓励他，赞扬他，也要保护他。樊思清的思想顾虑是很现实的，也是必须考虑的。我们在目前能做的是：不要扩散出去！

▲ 蒋南峰：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我无权代替受害者家属就樊思清的忏悔表态。我能做的只是：朱玉生父母均已过世，他有个弟弟还在，前几年经常和我联系。樊思清应该真诚地去取得家属的谅解才能得到最终的解脱。

▲ 樊思清：取得朱玉生的亲属的认可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在考虑中。我表示我愿意去，必须去！

▲ 阎淮：思清贤弟，若不嫌弃，我愿同去。  
让我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樊思清那高尚的心灵！

▲ 王嵩梅：蒋南峰，樊思清早就表过态要当面向朱玉生的家属赔罪、忏悔。目前你最了解朱玉生的家属，知道他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你也了解了樊思清的行为和态度。因此你是最好的中间人，知道当面忏悔结果是不是好，如何忏悔才能最好地解开两方的心结，认识到应该仇恨的是当年制造那种大环境的始作俑者。

▲ 范力：樊思清，思清兄，你的文章，有不少群友主张不公开，尊重你的隐私，保护你的家人。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就社会来讲，非常值得公开。一，我在1986年整党期间接触过一批“三种人”，文革中都是年轻的连、排干部，他们多是辩解开脱，很少认错，更不用说忏悔。他们认为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卢梭。二，你的经历，不是最惨烈的，是文革苦海的一朵普通浪花，又像唐山大地震压折的一根普通梁柱，但是具有典型性。一位彬彬学子如何充当一名“要武”壮丁，应当书写在清华的历史上，写在中国的历史上，警示子孙后代。三，你没有责任扩散这件事，也没有义务。但是，你已经成为一位高尚的人，公开了，不大会影响你的声誉。今天的社会正在走向宽容。周扬忏悔了反右时的恶行，朋友和社会谅解了。英若诚卧底，导致自己的亲哥哥被枪



毙，还有好多人入狱。他忏悔了，没有让英达兄弟受什么歧视。我觉得公开是你对社会的又一份贡献。个人管见，供参考。

▲ 李仕林：是不是一定要去取得家属的谅解，建议慎重。罗征启那样的人毕竟太少。

樊思清的过错已经受到较重的惩罚了（就个案比较而言）。道歉是良心的需要，不是惩罚的组成部分。道歉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在我们这个范围的忏悔，广义上就是一种道歉。向受害者家属当面道歉，等于再次揭开伤疤。这种道歉有很好的社会示范效果，但对双方当事人都是新的刺激，也有可能引来不理解。道歉还可以委托他人代为表达，双方不直接见面。

▲ 卢纹岱：樊思清，很佩服你想去朱玉生家向家属表示道歉的想法，这的确需要很大勇气。但是我认为现在时机不成熟。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向家属直接道歉就彻底解脱了，心情会更好。说得不好听些，就是死也瞑目了。（我也曾有过这种心情，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早些彻底了结就彻底解放了自己，没有了良心上的负担，死也瞑目了）。但是事情往往不那么简单。事先需要了解他家庭情况，要有所准备！所以建议你不要感情用事。

▲ 林贤光：樊思清：再提两点看法供参考。

1，你的文章，我不主张公开发表。理由是，如今的社会不具备宽容的条件和气氛，发表很可能引起反作用，或者成为某些人的把柄。对己对人都达不到想象的目的，反而添了麻烦。

2，我也不主张你去朱玉生家赔礼道歉。如朱家老人还在，事过近50年，对他们已经淡漠了，何必再揭起这个伤疤？老人大概至少和我岁数差不多，是否受得了？如老人已经故去，年轻一代就更没有必要了。请考虑。

▲ 郭莹：关于是不是需要向朱玉生的家人表达自己的悔罪，以及是不是可以或者应该在大范围内公开《我要忏悔》文章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不要这样做。特别是大范围公布这篇文章，不仅不可能收到积极的效果，反而会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首先，当局坚决反对把真实的历史予以披露，因为这些材料将最终导致质疑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其次，社会上有非常强大的势力，正在竭尽全力美化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定会对你的文章发动围剿。

第三，当前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在价值观方面，在道德底线方面，已经严重撕裂，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难于找到共同语言。

所以，如果《我要忏悔》公开发布，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封杀、打压甚至被无知青年认为是“作秀”，而你本人则不但有口难辩，最大可能就是你和你的家人遭到“人肉搜索”，而无法安静地生活！

应该说，在我们这个群的范围里，你得到了谅解，你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这已经完全可以了。

▲ 孙怒涛：樊思清有向受害者亲属忏悔的勇气和诚意。能不能做，需要事先了解亲属的态度和可能的反应。能接受樊思清忏悔的，可以做。不能接受的，做了对双方都不利，就不能做。

樊思清的忏悔，在全国都是稀有的。一定要珍惜樊思清的忏悔之心，要保护他和他的家人。

樊思清的忏悔，意义很大，影响很大，要是处理不当，伤害也会很大。所以，我们务必慎重再慎重！

▲ 阎淮：在保护樊思清与社会意义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人，具体、个体的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属地；是人性，人道，人权的载体。

我可能或不可能为整体牺牲自我的从丝毫到全部（不敢说）。

但我，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和权利，号召和鼓励别人如此！

窃以为：目前在此群，我（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呵护、爱护、保护那曾经迷失，倍受惩罚，已经净化，还在煎熬的高尚心灵。

▲ 李包罗：道歉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事。忏悔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和他人无关。世上有被别人逼出来的忏悔吗？

▲ 顾耀文：李包罗，赞同你的看法。人与人之间有亏歉，需要的是道歉，面对自己的灵魂或者面对上帝需要的是忏悔。人都会有点不想让人知道的憾事和过失，所以教堂里有忏悔的小屋，只对牧师说。人都有良知，天良未灭就会有忏悔的需要，求内心的平静。佛教禅宗的立地成佛也是这意思，放下屠刀，洗净灵魂，就立地成佛。

▲ 孙怒涛：樊思清这篇文章要不要扩散？是到此为止，化名发表还是实名发表？这一切都应该也只能由樊思清自己决定。我们可以多从樊思清的角度想想各种方案的利弊和风险供他参考。也请樊思清给自己一段冷静思考的时间，在深思熟虑后再作出决定。他的任何决定，我都会充分尊重和坚定支持。

#### 四、关于真相与和解关系的讨论

▲ 王铁藩：孙毓星，“文革反思是两派和解的基础，两派和解是文革反思的重要成果。”这句话很经典，但不够深邃。可以加这么一句：和解是以兼容并包的心态理解对方，和解不必消弭双方的歧见。

▲ 孙毓星：铁藩，谢谢指教。清华团、四的和解过程是一个践行民主的过程，和而不同，有分歧也有共识。这一良好风气已在我们的校友社区和群里生根，在议论时政的时候都自觉维护社区的和谐。我觉得这是我们反思文革的又一重要成果。

2011年借百年校庆之机，两派头头和干将相聚卢沟桥。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陆小宝都是第一次露面，团派有陈育延、陈继芳、马小庄、王良生、李自茂、沈昆等。崔兆喜特意从西安赶来，见到陈楚三先施90度鞠躬礼，表示对当年抓捕他的道歉。陈楚三也颇有大哥风度，既往不咎，还围坐一起畅谈，包括耐心回答老团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是两派和解过程中动人的一幕。这个过程历时几十年，它有赖于两派中有识之士的不断推进，也是清华学子都喜闻乐见的结果。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我们需十分地珍惜。

▲ 徐耀寰：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虽然不能对人性的恶负责，但确实把人性的恶推波助澜发扬光大到了极点。

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真诚的忏悔精神。现在是很多伤害人的人不出来忏悔，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而是担心被追究责任。民族和解与宽容必须在说清是非之后，做了错事先忏悔然后才能取得受害方的宽容。

樊思清同学的文章宝贵之处在于这正是我们民族兴旺复兴的必要一步，目前非常缺乏的一步。

▲ 吴学民：从一个极权社会过渡到正常社会，和解是必修课。南非当年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具体到清华文革前两年的真相的追求，是以人和事为单位还是以派为单位至关重要。我们应向南非学习，他们不但追究前白人政权犯下的罪恶，也不放过黑人反抗过程中侵犯人权的行为。

▲ 方莉莎：12人反革命集团，蒯司令和刘才堂都否认有，而谢引麟、黄安妮等却实实在在受过酷刑，追问一下真相到底是什么总不为过吧？

▲ 王克斌：应当把矛头对准始作俑者，对准这个集权暴戾的制度。

▲ 林海：不能因为揭露所谓真相，重新陷入了派性争斗，忘却了反思文革的意义，是防止新文革的到来。

▲ 冯钧：揭露真相是忏悔的第一步，有了真诚的忏悔才能谈到真正的和解。

▲ 高小康：1、一直建议反思文革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才能教育下一代。事实就是真相，从这个角度讲，我同意在重大问题上讲清真相。

2、重大问题上讲清真相不容易，因所在位置不同。现在让当时观点对立的人讲同一件事，极易讲成“罗生门”。“727结束武斗”一事，我了解蒯大富讲了一个真相，沈如槐也讲了一个真相，具体内容差别很大，如果让他们二人当面对质，只会又吵得一塌糊涂。很多时候，可以分别表述，只要讲出来就可以了。只希望能有大量有关文革真相的素材，供我们后人有心人整理。

3、非重大事件不必要要求讲清真相，说实在也讲不清真相。

4、“重大”、“非重大”，目前没有权威可以划分，也只能自己判断。

▲ 孙毓星：在现时档案资料不公开的情况下，个人回忆口述历史尤为重要。对此我们也不能苛求，记忆有偏差，认识有局限甚至为某某者讳，都可以理解。讲话的人多了，不同视角观察，自然更接近于真相。

只是大家都要平和一些。我有幸参与了这几年反思文革的历程，深感是一次民主精神的学习和实践，而且确有显著成效。试想，如果我们一代清华学子都学不会民主，那中国的民主还有希望吗？

▲ 李仕林：真相是需要的，但并非什么真相都需要，更非需要无限的深度。

▲ 张从：对文革中的事件，真相应该搞清，弄清是非正误。过于细的细节就不一定去追究和重现了，特别是有些涉及个人隐私的情节。

▲ 王嵩梅：遗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各自都说，多人说，记得多少说多少，互相启发提醒，就可能显现出事情的全貌。到这个时候了，不必争论对错，不谈谁的责任大小，只求事情的真相，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 蒋南峰：我坚持认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不能因为历史是大理石就不需要以史为鉴。真相追索到什么程度，不可能穷尽全部，但要尊重受害者的权利。

▲ 陈中平：史学须以史料为源，可靠的史实则是基础。注意历史细节是必要的，但常常难以深入下去。

重要且可信度较高的细节（如蒋介石日记），确实可能开拓乃至改变某一段历史研究的方向或结论。

鉴于目前研究文革的主客观条件限制，还是要着重抓住较大的课题，即使仅从某个局部有所突破，也是有价值的。

▲ 陆元吉：樊思清的忏悔和科学馆的回忆引发了校友群中的风波。此事显示反思文革，寻求共识，达成和解之路的艰难，其艰难程度可能超出预计。文革中受伤害者不计其数，但受害程度大不相同。一般人很难体会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他们的伤口深度。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伤口未愈，情绪难平。情绪化的宣泄没有积极意义，但其他人应给予理解和宽容，特别是在很多真相还未被揭露之前。真相是反思的基础，也是共识和解的基础，但遗憾的是仍有太多真相未被揭示。黄安妮所追问的十二人集团只是其中一例。希望在讨论交流的同时能弄清更多的真相。在真相基础上的共识、和解将会更加深刻和牢固。

真相是认知的前提。这是常识，并不深奥。杨学长的“墓碑”揭示了大饥荒的真相，多数人才有了对这场灾难的认知；文革中广西大屠杀和人吃人的真相，才使更多人对这场运动深恶痛绝。南非的真相及和解委员会对南非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卞仲耘丈夫拒绝宋彬彬道歉的理由是真相仍被掩盖。清华文革的亲历者有权了解真相，当事人有责任说出真相，这可理解是他们最后的历史责任。至于愿不愿负责，旁人无法强迫。从根本上说，追寻真相和派性无关。只要心平气和，多释善意，真诚相对，负面的情绪是可以化解的。

追寻真相并不是只要细节，这分明是两个概念。还是举所谓“十二人集团”的例子。四个女生被关近三个月，受尽折磨。近五十年了，却始终不知此事的来龙去脉，无人出来说过真相。好像这事不存在，又好像加害她们的是一群外星人。这类既非小事，更非细节的真相难道不应当追问吗？

## 五、不堪回首的武斗场景

▲ 邱心伟：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在十多年前写的，直到现在我也不愿意再把它过多“完善”和“润色”。正因为曾有过这段经历，才让我念念不忘清华文革，念念不忘我们这代人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告诉后代人，不让他们重走我们的老路。

《科学馆的最后日子》（摘录）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我弹着曼陀铃，和着大家悲壮的歌声。黑洞洞的科学馆里没有灯火，许多人挤坐在楼道中用于电池充电串起来的几个小电珠泡的旁边。

悲愤、压抑，这种白天晚上都不见光亮的日子，已近两个月了。虽然有时大家争论着大字报中曾辩论过的问题，有人谈着他的妈妈，有人甚至为“熊掌为什么最好吃”争得面红耳赤，但心中都在悲怆地呼喊：我们是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不怕死……现在有着生命危险，他老人家知道吗？！

我已跟北京的一个要好的表妹写过“绝命信”，信中发誓：“……我决心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假如哥哥要攻上楼来，我也会举起长矛……”。

科学馆的地下室中，放着两具战友的尸体，杨志军和朱玉生，一个电机系、一个土建系的同年级学生。杨志军出事前晚，还在教我用柳条帽发豆芽，我清楚地记得他用手拨动着柳条帽的动作和眼神。他们都是忠厚、老实可亲的好人，为了信仰？追求真理？仗义？或像我无法回家来到了科学馆？朱玉生晚上去工字厅值班，就被老团用枪弹打死了。第二天，杨志军在门口值班，又被打中。为把同胞尸体运出馆，派两个力气大的女同学抬着担架，打着红十字旗，一边放开喇叭跟老团打招呼，一边开了大门出去，走不了几步被子弹逼了回来。老团已丧尽天良了。

屋顶，已被老团打过来的燃烧弹烧没了，只剩下几个拱型门。在消防队的援助下，火没往下蔓延，但自那天开始，天公跟我们作对，下了几天没完没了的雨。

没屋顶的整个楼里都是湿漉漉的，发散着腐霉臭气。

没有蔬菜、大米……我们天天吃着盐水片耳汤，加没有发面、没有油的花卷。

这些还是武斗开始时从某饭厅抢来的面粉和煤。不愧为学工科的学生们，真能动脑筋，在大教室中砌灶台架锅，把从体育馆夺来的比赛用跑车和实验室里的鼓风机连接起来。没有电，就由男同学轮流拼命蹬自行车把煤块点燃，百把人的一顿顿饭就是这样做成的。

没记得有人向我布置工作，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负责病号饭。我用很多天以前强留下的几棵茄子、卷心菜，在老四工人头头吴国梁的指导下给伤员下挂面。

屋顶烧没有的第二天，我上三楼一看，菜全烂了。我一屁股坐到楼板上，不由得掉下了泪：我拿什么给那些急需营养的伤号们吃啊？！

通讯：刚开始进科学馆被老团包围困住时，在屋顶上打旗语。晚上用科学馆实验室中搜罗的五节电池手电筒，挂在用砖封堵起来的窗外，连上一根电线接收发报键（都是科学馆实验室里的东西），达一滴滴一达一达，打信号。由于武斗的升级，旗语已不能打了，在二教的南端头，用喇叭喊信号……

二楼的南端屋中，4·30战役撤下来的和6·30从8号楼撤过来的几个重伤病号，躺在地铺上。他们中有几个受枪伤的，葛伍群是被长矛刺中背部的。还有李光鸣、朱顺波等后来受的枪伤……虽然校医院院长张寿昌是我们这一派保护的干部，他曾参加过革命战争，武斗时刚好到科学馆来，被头头们留下了，但科学馆里除了有几针青霉素、碘酒、酒精和纱布头，什么药也没有。他用着革命战争年代时用的方法，控制住了这几个伤员的炎症发展。

他们默默地忍受着烧热、疼痛的苦处。看着他们蜡黄的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我们知道随时都有病情恶化、生命危险的可能。小粘糊（左开才）平常很内向，他在屋顶上值班打旗语时，被老团礼堂上大弹弓打来的大石块打中。那天抬下来时，脑袋上的皮肉翻开，一片红红、白乎乎的东西冒出来。我们都以为是脑浆，要完了，要完了！可他硬是在张寿昌的手术——酒精+缝针下活了过来。

左开才躺在那间临时的所谓医务室的长条桌子上，他一声不吭。我和孙慧很慌张：他不会死？他脑子没感觉了吗？我们拼命给他吹口琴、讲故事、唱歌，希望能传给他一些精神力量，支持下去！不要倒下！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头头们在讨论对策：

坚守：粮食还能用多少天？伤病号怎么办？尸体要腐烂，怎么办？

突围：战争已经升级，用上了枪、手榴弹，而且包围圈越缩越小，工字厅都是老团的了，已牺牲了两个，硬冲出去，还要牺牲更多吗？

挖地道！从二教和动农馆两头挖。挑了些身材瘦小的男女同学，没有我，有孙慧、黄斐梨。

地道在通宵排班地挖，动农馆那边也在挖，那是我们的生命线。

我们也开始锻炼身体。

除了洗纱布，我们几个女生跟张寿昌学医疗抢救、包扎，好在大一军训时学过。我们找了一根破自行车内胎，剪下一段料，再剪一个十字口，用医用夹子夹住弯弯的缝伤口针，练习穿线，再使用夹子夹住这针缝“伤口”。

停在一楼尸体的腐烂味已飘到楼上了。王拈生是物理系教师，他带了几个人，把尸体用两张实验室桌合起来盖上，再找出实验室的胶把缝封住。孙慧这个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看起来天真无比的小女学生也参与了。

眼看着粮食一天天少下去，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地道的连接。

已快通了！3米、2米……，老团早估计到我们在挖地道，在地下埋了一口水缸，探听到我们挖地道的方向。那天早晨，在快通的那一刹，引爆了炸药……

轰一声，炸毁了地道……我们挖地道的人也不见了……

▲ 黄安妮：邱心伟，刚看了你的文，一边看，情不自禁流了泪，说不清是为了什么？

▲ 陈天晴：邱心伟，刚看了你的文章，我觉得心在滴血。

▲ 樊思清：刚刚看完邱心伟的文章。太惨了科学馆！比我以前想象的还要惨。

可怜的是科学馆100多号人在地狱里度过的那些天。我感到我的罪恶深重——我的确面对邱心伟们——我很感到恐怖。

▲ 吴学民：原来在科学馆的同学受了很多苦。我在礼堂顶值过班，很有可能拉过弹弓。在此郑重道歉！

▲ 汪晓光：科学馆，这个清华校园里神圣的科学殿堂，曾几何时却变成了一群本该献身科学的人的炼狱。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呀，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虽然是五十年前的事，今天读来仍然十分震撼，引人深思。不能不问一句：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又是为什么？！我们该如何回答这历史之问。

▲ 孙铮：关于反思文革，已故的崔兆喜同学在2011年卢沟桥聚会上曾发言说：“我非常支持大家写，这段宝贵经历大家不要轻视，但是不要单纯地为了回顾而回顾，要回顾历史，把握当下，促进将来。阿弥陀佛。”

谈到武斗，看了邱心伟的科学馆回忆，我想起崔兆喜去世前不久与我们的交谈，还背诵了陆小宝当年写的一首诗：“枪声寂静角声连，夜夜征夫披甲眠，暗数繁星寻织女，银河横渡是飞船。”

念着念着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边哭边说：“啊，这是宇宙飞船呐，宇宙飞船漫天飞了好几年了，清华才子们还拿着最原始的长矛……（哭得说不下去了）”

他擦去眼泪，又说了两个字：“好诗。”

▲ 陆小宝：孙铮，第一次听到你讲这件事：崔兆喜临终前不久在病床背诵我的小诗，还哭得说不下去。我非常感动，也落下眼泪。

这首诗写的是武斗期间某天深夜，我在驻守的汽车楼楼顶上，披坚执锐、守值站岗时的真实场景和感慨。只是那个情景更加悲愤：在汽车楼顶俯视四周，整个清华园被笼罩在半明半暗之中，不远处的科学馆还在包围之中，广播喇叭播放的一组组阿拉伯数字密码，时时夹着一些“团流氓”和“死婊子”之类的对骂。夜色渐深，寒露侵甲，仰望澄碧太空，但见繁星满天。人家都快要登上月亮了，我们在做些什么呀！这涌上心头的一股股的悲凉心情，用一首二十八个字的七绝，怎么能表达得出来啊！

▲ 陈长坤：樊思清，你好！武斗时听说你开枪杀了人，我很震惊，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啊！我文革中也勉强算是团派的吧，但我始终不参加两派的武斗。当时也有人希望我能参加守卫大礼堂。六月中的一天，有人带我与我班的另一位同学登上了大礼堂的顶部。是谁，我忘记了。我原来还不知道大礼堂的屋顶还可以上去的。大礼堂的屋顶很宽敞，上面架了两个大弹弓，用于向科学馆发射石头。他们说这就是大礼堂的制高点，是监视科学馆老四的阵地。老四也向大礼堂顶发射石头。就我们呆在屋顶之际，老四的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正巧打中了守卫屋顶的一位老团，当时鲜血直流，大家赶紧将他送往医院。我们在屋顶也就呆了一个多小时，我还是不想参加守卫。后来我看中央也不想解决清华两派的武斗，我就于六月中下旬回家去了。八月底接到通知返校，才听说你打死了人。之后再未见过面。今天看到你写的长文章，才知道你的详细情况。樊思清，你的忏悔是真诚的，你后来的人生轨迹也是令人感动的。我为你祝福！

▲ 樊思清：科学馆的大弹弓，比大礼堂的威力大，射得准，伤过大礼堂两个人：一个刚才陈长坤讲了，还有一个是清华园中学的毛立明，伤后我带他去同仁医院看的。

▲ 沈昆：我当时在洋枪队。据我所知，团派当时有如下洋枪：1 1支半自动，2支冲锋枪（56式和苏式40年代各一支），1挺机枪（很旧，打靶时子弹横着飞），手枪与驳壳枪数量不详。半自动和56式冲锋枪应该是从武汉搞来的，大概是当地群众组织给的。其中有10支半自动没有枪栓，是到校后自己加工配的。

▲ 樊思清：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多少遍！不解其答案。也一直埋在我心中，找不到讨论的对方。

今天我觉得可以提出来讨论讨论——如果我们之中有一个“林肯”、“丘吉尔”、“曼德拉”发出声音：“我们不打了！”“大家解散回家！”——有可能吗？

▲ 卢纹岱：樊思清，你说如果有人站出来说：我们不打了，解散回家……，可能吗？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这是不可能的。我是老四，从武斗一开始，我就很积极。首先是从九饭厅抢白面搬往对面的学生宿舍，忘了是几号楼。第一次扛一袋面，后来扛两袋，最后一次扛三袋面，压得头歪着抬不起来。那时就是认为毛主席说，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老团就是国民党。一个同学拿着长矛去打仗，第一仗就被大弹弓打破了面罩，额头开了口子。这次武斗还知道真的死了同学。我感到不能这样下去不应该武斗。于是我把想法对几个熟悉的同学说了，劝他们退出武斗，但说谁谁不听。我说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以后总有一天会算账的。我回家了，离开了正在武斗的学校，被人说成是逃兵、胆小鬼。我妹是军医大学学生，穿着军装进校劝说她熟悉的同学，一个同学骑着自行车把我妹妹送回家，自己又跑回学校。第二次我妹又去劝说，这个同学又骑车送她回家。这一次这个同学被住在我家的同学扣住才没能回学校继续参加武斗。另一个同学被燃烧瓶烧了脚腕子，到我家养伤才没有在科学馆继续参加武斗。你想想，那种把对方看成国民党，你死我活的斗争，怎么可能有人出来说你所幻想的话呢？

▲ 孙怒涛：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即便到了今天，还会留下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疑问。有些疑问很个性，虽然不解开也没多大关系，但心里总希望能解开谜底。有些疑问有共性，既有关乎事实真相的，也有关乎真相背后的根源。只要氛围是良好的，这样的过程对于进一步的和解是有益的。一些校友的提问和樊思清的回答，总的气氛是比较良好的。

这两天，樊思清几乎对每个与他有关的帖子都认真地回答着，令我感动。樊思清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可以澄清，也可以申辩。可以反问，也可以追问。这些，都是樊思清的权利，与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权利。我能感觉到樊思清很珍惜这次与大家推心置腹、坦诚交流的机会。我还感觉到樊思清已经把自己作为校友中的一员，平等地与大家一起参与讨论。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揭露真相，有助于反思。现在的我们，在揭露真相的过程中，已经不会再记仇于某个老团老四，不会再记恨于团派四派。我们会思考同一个问题：我们誓死保卫的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之间却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

（编者附记：2016年6月6日，我从杭州，蒋南峰从北京，朱玉生的弟弟朱先生从淮安，我们相约专程来到南京相聚。朱先生向我们介绍了朱玉生父母（都已过世）和兄弟姐妹这几十年来情况，我们向朱先生介绍了樊思清已经在部分校友的范围内公开忏悔和向朱玉生家属赔罪的真诚愿望。朱先生对樊思清的忏悔和赔罪表示肯定和欢迎。我回来后，对情势进行了评估。考虑到变化难测的大环境和无法把控的今后局面，我认为在目前阶段樊思清前往淮安向朱玉生家属当面赔罪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缓行。）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